

关于江西经济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后，江西经济一直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政府核心能力一直不能到位，缺乏引导市场机制形成和提供良好公共物品等关键服务，从而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能力；第二，受弱政府的影响，作为赢利中心的企业部门的竞争能力较弱。改变江西的根本办法，是先改变博弈规则，和发达地区进行制度对接，并大力发展交通，使江西的区位优势真正突显出来。

一、改革开放后，江西为什么会落后

“有条件的地方优先发展”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战略。优先的好处和根本主要不是中央资源的投入和税收的优惠，而是采取发展的新办法即制度创新先行的权利，核心是市场化的优先权。这是一种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政策，容易引起地区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在差异化的制度背景中，非优先发展地区需要依靠强政府或强民间部门的推动，敢于在地方自发地从事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活动（核心是促成市场机制的形成），激发当地企业部门的活力（核心是确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用新体制增强本地的资源配置能力，与制度创新先行的地区进行竞争。比如浙南就是靠强民间的力量推

动，浙北、苏南等地则是靠强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如果两种能力都不强，甚至是很弱，那么该地区不仅会与优先发展地区的经济差距拉大，也会与政府能力或民间能力比自己强的同类地区的经济差距拉大。

江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在 90 年代又形成了与条件类似甚至条件更差的内陆省份（比如安徽、湖南等）的差距。为什么江西在 80 年代走下坡路后，在 90 年代继续走下坡路，无法扭转一直下滑的趋势呢？

我们的研究认为，江西经济一直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长时期以来，政府核心能力一直不能到位，缺乏引导市场机制形成和提供良好公共物品等关键服务，从而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能力；第二，受弱政府的影响，作为赢利中心的企业部门的竞争能力较弱。

（一）政府核心能力的不足：缺乏驱动市场机制形成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如上所述，从根本（制度）上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来源于有效的企业组织在新体制成分即市场机制中的活力，表现为由市场化带动的工业化。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取决于市场机制形成速度的快慢，从而工业化速度的快慢。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地区市场机制的形成依靠几方面的力量：第一，民间部门（主要是企业组织）驱动的诱致性“形成”（变迁），可以称为民间驱动模式；第二，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形成”，可以称为政府主导模式；第三，上述两种力量的结合。现实中可能由哪种模式来主导，和两个因素相关：一是传统地方政府的规模和力量；二是当地企业组织和民间部门的创新能力。在江西，计划体制时期的地方政府规模和力量很大，国有企业比重很大，农村的工业化活力又很弱，因此政府的驱动十分重要。

改革开放后，政府驱动的核心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

和推动市场机制形成的能力；二是提供公共物品及其他关键服务的能力。但是，江西政府的主导和驱动能力一直很弱，致使江西的市场机制形成速度始终较慢；由于缺乏市场机制和新办法，企业组织的能力没有得到解放。弱政府是解释江西经济落后的关键。

在江西，政府官员能力下降引致了政府体系两个很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环境：其一是思想保守，不敢创新；其二是政府努力不足，“做官不做事”是主体环境。在低效率任人惟亲机制的作用下，政府官员把精力放在拉关系上（努力成为上级的亲信）的边际收益大于做事的边际收益（升官的概率大）；由于做事越多，失误的概率因而机会成本就越大，同时政府不做事所带来的地方经济欠发展的社会成本，最终并不由政府官员来承担（是普通老百姓承担）。由此，在政府体系形成了“做不如拍，做不如看”的内在机制和行为环境。

由政府能力脆弱所内生的不敢创新和“做官不做事”的行为方式，导致需要创新才能进行的市场机制的形成速度缓慢；在缺乏市场机制的环境中，企业部门的能力和活力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因而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就上不去，而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进一步加大了创新的风险，产生“保守—落后—进一步保守—进一步落后”的劣性自增强机制。

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进一步影响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规模和速度（比如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建设），也难以提供其他的良好服务，而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和其他关键服务的不到位，又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能力。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而政府部门的开支又不断增长，政府很难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与日俱增的公共开支，从而不得不加重对民间经营部门的收费，到处设卡设证，形成“恶”政府的机制。这样一来又加重了民间部门的负担，损伤了赢利部门的生存和竞争能力，使老百姓不堪重负，从而在整个江西造成了“越穷越收、越收越穷”的恶性循环，长期困在“拉费陷阱”中难以自拔。

（二）企业与民间部门的竞争能力较弱

改革开放后，江西的现有企业整体竞争能力较低，新创企业数量和规模从来就不足；在整体上，江西不仅国有企业不行，非国有企业也不行。从根本上说，这是政府能力不足和行为方式低效率的产物。

第一，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弱。国有企业低效率是一个全国普遍现象，大体原因也差不多。江西的问题是由于政府能力弱和不敢创新，没有采取措施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因而使国有企业的问题越积越多，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第二，非国有企业力量弱小。江西非国有企业力量的弱小在本质上也是政府能力不足的产物，核心问题是政府没有为民间部门提供市场化的良好条件。由于缺乏市场化空间：其一，非国有的民间部门缺乏边干边学的环境，造成市场化能力与经营能力落后；其二，造成本地有市场化能力与经营能力的企业家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流失，从而丧失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能力要素”，大大削弱了本地企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和浙江等地相比，江西的民间部门确实存在能力脆弱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农村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能力的不足，即由于缺乏农民企业家资源和信息资源，在政府给予的有限的市场化空间中，依靠农业和农民资源的乡镇企业在江西发展不力。

这既是江西经济发展路径演进的结果，也是政府以农为主发展战略导向的结果。江西乡镇企业经营的市场全国化的能力比较低，因此规模一直上不去，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缺乏专业化推动能力，未能配合本地企业就本土的优势产业在当地建立工业和产业体系，形成专业化的垄断势力。当竞争加剧到一定程度时，江西的绝大部分乡镇企业由于没有做大和缺乏地区工业体系的原因，纷纷倒下了，因而江西经济也塌了半边天。

二、当前条件下，一个振兴江西经济的理由和行动战略

（一）振兴江西经济大有希望

在现在的激烈竞争条件下，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振兴落后的江西经济有无希望？有！理由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旁侧（扩散）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江西将获得较强的旁侧效应的机理及过程。从收益的角度，江西正成为发达地区资本的角逐之地。由于市场机制形成速度快，中国的发达地区通过极化效应和资源积聚的能力，吸收了附近地区乃至全国的落后地区资源，与落后地区形成较大的发展差距。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虽然企业资本规模做得很大，企业家和技术等要素资源也十分丰富，但由于竞争加剧和城市化升级的原因，边际报酬率逐年下降。这时，该地区的资本和企业家开始寻求出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出路就是向落后地区寻找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旁侧效应（也可称为扩散效应）。江西是离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最近的一个有发展条件的落后地区，而且具有较好的要素供给条件（即梯度差较小），因此接受发达地区旁侧效应的机会最大。

从成本的角度，产业结构的地区性重新洗牌（Reshuffle）为江西带来机会。在当前条件下，全球的产业结构和全国的产业结构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制造业领域的激烈竞争使得企业不断寻找降低成本的方式，包括向落后的低成本地区布置或转移生产基地；一些大企业随着产业成本的演变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产业结构。这将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江西完全可以主动地把广东、福建沿海、上海等发达地区不得不抛弃的产业接过来，通过低成本的优势加以链接。

第二，江西大有未被“后天优势”有效整合与利用的先天优势

资源。可以说，江西从南到北有一省的好山好水，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先天优势）。当然，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在中国很多，但是像江西这样靠近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从而靠近消费群的旅游区并不多见。然而，由于江西缺乏发挥先天资源优势的“后天优势”，我们的旅游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发挥。江西大有未被充分挖掘的资源。

第三，在一些大规模行业，率先利用产业组织政策获取巨额利润的空间很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推行产业结构政策失败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并不是说政府在产业发展中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国现行的竞争结构状况和国有企业占比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是推行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的核心是对行业竞争结构进行重组，改变企业的数量和组织结构，将过度或低效率的行业竞争结构改组为适度或有效率的结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收回五个指头，握成拳头打出去”。在江西，利用产业组织政策增强地方产业的竞争力而获取巨额收益的空间十分广阔，最典型的是烟草、旅游、矿藏开发等资源产业部门。

第四，非国有企业发展 and 国有企业改革改组的潜力很大。如上文所言，江西的非国有企业组织之所以没有活力，在根本上是我们的政策没有到位；国有企业之所以不行，是我们的制度和改革没有到位。只要政府在改革、改组和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包括前沿创新政策）到位，非国有企业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在江西，由成功的改革和改组带来的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二）抓住和解决要害问题，推行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超常规发展江西经济

1. 先解决要害问题：快速解决政府核心能力不到位的问题。由于政府能力脆弱是江西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振兴江西经济

的第一步是着手解决政府核心能力不到位这个要害问题。

(1) 改变政府行为模式：先立后破，确立新的收益规则和成本规则，用新的规则来解放人们的思想，快速改变江西的政府行为方式。在解决政府能力不到位的问题之前，先要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环境。要改变这些东西，不能走只靠宣传鼓动等传统的解放思想的老路子，而要采取新的思路和办法。新办法的核心是，要确立新的收益规则和成本规则，使干事的边际收益大于拉关系的边际收益、干事的边际成本小于拉关系的边际成本，以新规则来建立“干而非拍”的各级政府新行为方式。只有用这种先立后破的办法，才能彻底铲除在历史派系斗争的基础上演进而成的“做官不做事”的模式。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解放思想的实际办法很简单，就是江西的领导人一定要确立可以置信的承诺和威胁，“承诺”能干就上，“威胁”不能干就下，以实际的行动和案例来显示承诺和威胁的可置信性。只要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了，各种限制民间部门发展和创新的规则改变或放松了，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民间部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快就能得到发挥。

(2) 组建能干的各级地方政府，以任人惟贤规则重组部分人事，使政府核心能力基本到位。确立新规则和解放思想虽然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但是光靠解放思想并不能够立即解决江西的问题。虽然在新规则或新机制的作用下，各级政府官员都会努力解放思想和干事，但思想解放只是解决一个敢不敢干的问题，江西的事业不仅是需要一个敢干的政府，更需要一个会干和能干的政府，一个具有管理现代市场经济核心能力（在早期是促进市场形成，现在主要弥补市场缺陷和增强市场功能）的政府。对具体的政府官员而言，敢干的问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但是能干的问题则是一个长期问题。然而，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地区竞争，我们必须只争朝夕。

所以，在江西发动解放思想活动的同时，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组建能干的各级政府，当然，核心是重组部分人事。重组的规则是

任人惟贤，让懂市场经济、善于管理和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贤士掌握经济管理决策权。根据当前局势对不同层次政府能力要求的轻重缓急，我们需要尽快解决地市级（特别是后文谈到的作为增长中心的地级城市）、省级经济职能部门、县级三个层次的政府官员的能力问题。当通过政治的博弈确立以能力为核心的组织规则之后，在技术上解决政府官员的能力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难题，取决于可供选择的贤士规模和识别与选择方式。

2. 处理好当前的经济战略问题，使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快速到位。组建能干的地方政府的关键，是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功能到位。在当前条件下，地方政府既要做弥补市场缺陷的工作，又要做增强市场的工作。从发展战略上讲，我们必须走“内外并举”的道路，江西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涵盖“借助外力”和“整合内部”两方面的内容。

(1) 江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A：启动旁侧效应，借助外部的市场力量。

战略问题 1：快速发展基础设施。

要推动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尽快启动旁侧效应的作用。要使江西的区位条件成为竞争旁侧效应的优势，前提条件是交通设施必须到位，在当前条件下，尤其重要的是高速公路。快点修路是当前江西经济发展的第一战略问题。

江西主要从两个大的方向接受强旁侧效应。一是从东南部接受广东（包括背后的香港）和福建（关键是背后的台湾）等发达地区的辐射；二是从东部接受浙江和上海等地的辐射。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把通往广东和福建的高速公路和通往浙江、上海的高速公路修通。修路的秩序是先从资本的家门口开始，即从外往里修，而不应该从江西境内往外修，营销的基本原则是先要方便自己的顾客，而不是方便自己。

战略问题 2：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高标准推进城市化建设，推行开放型经济发展主战略。

投资环境是硬件设施和人文环境的统一，江西要竞争旁侧效应，首先要营造优越的投资环境。路是硬件设施中的第一要素，硬件设施中的第二要素是城市化建设。现代工业企业对城市规划的要求早已超过三通一平，而是进一步提出了对环境的要求。因此，我们的城市化工作既要搞好设施建设，也要搞好美化建设。

人文环境的建设包括很多方面，最主要的几点是：第一，生产和生活的安全性；第二，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第三，高效的政府服务；第四，轻松愉快的业余生活和良好的人际社会环境。良好的人文环境需要政府和民间部门共同努力，但政府的努力是关键。不管什么工作，最基本的规则是严格执法和执规，只有依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建设良好的地区人文环境。

战略中的策略：根据各地的区位经济特征，推行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政策，以城市化工作为基础，确立经济增长中心，以增长中心为依托重新规划行政区域。

城市化是需要巨额投资的，投资的主体是政府（不排除有些项目可以和民间合作）。问题是江西政府的财政能力比较弱。在这种条件下，需要我们集中财力，先着力规划建设好几个有快速发展潜力的城市，确立江西的经济增长中心，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政策。当前的任务是明确一级和二级增长中心。

首先，一级增长中心是南昌。从综合条件来说，把南昌确定为一级增长中心是毫无疑问的，这意味着江西城市化的投资将主要用在南昌；其次，二级增长中心是赣州、上饶和九江等地级城市。把这些城市确定为二级增长中心的依据是它们比其他地级城市靠近资本，是旁侧效应中接受辐射最近的地区。如果确定这些城市是二级增长中心，那么继南昌之后，江西的总体城市化投资将向这些城市倾斜。

对城市化建设，我们提出的几点建议是：第一，对这些城市的规划要长远、眼界要高，架子要拉得大，南昌要往特大城市的方向发展，赣州、上饶和九江要往大城市的方向发展，以这些城市的发

展形成对相关地区的积聚；第二，城市化不能空搞，必须以工业化作为基础，最好的结构是做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联动发展，形成互增强机制；第三，提高城市的积聚能力，降低农民进城成本，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市场，改变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提高城市化速度；第四，以增长中心和城市化为依据，重组部分行政区域，将增长中心的行政区域和人口扩大，合并一定的乡镇和县级区域；第五，一定要着力建设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安全保障网，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第六，努力降低城市化的投资成本，把门槛和升级基数尽量放低。

(2) 江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B：改革和改组，有效配置和整合内部资源。我们认为，在江西配置内部资源的战略问题核心，是改革和改组。

战略问题 3：采取新的措施，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大胆改革改组国有企业。

在当前条件下，发展非国有企业，不能简单重复和学习发达地区走过的老路。我们不仅要使政府的基本服务职能到位，还要站在别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往前走，冲击制度创新的制高点，更进别人一步。改革江西的国有企业，核心是要有政治胆略和勇气。

我们要放开政策发展非国有企业：第一，严查和制止“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实行放水养鱼的抚民政策；第二，放下只收不做、“惟政独尊”的不良习气，开通为非国有企业提供政府服务的高效通道；第三，开创为非国有企业发展积极创造新条件的机制；第四，开拓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创新空间和手段。这一切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得到保证。

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其制度的无效，实践证明现有的国有企业制度已经无药可救，出路在于彻底地改革。改革和改组国有企业在当前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措施和办法问题，而是一个胆识和胆略问题。在不少地方，已经成功实践过诸多国企改革和改组的措施，已经闯出了路子。在江西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不容易，

但最终还是一个胆识和胆略问题，只不过是更大的胆识和胆略。只要措施到位，时间表和先后顺序对头（这个比较重要），国企改革一定能够逐步走向成功。而国企改革的成功，对江西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战略问题 4：以改革改组先发制人：在某些产业中推行产业组织政策，获取创新巨额收益，形成大行业竞争优势。

江西确实存在资源优势，但是一直都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江西人在自己巨额资源的金矿中只挖到表层。要把江西资源的潜力挖掘出来，既要解决老问题，又要采取新手段。解决的老问题是：第一，政府对资源产业的基本服务和政策一定要到位；第二，资源产业中以国有企业制度为主的运作机制问题要解决。为了应对激烈的全国性竞争，也为了提高省内的竞争效率，充分挖掘资源潜力，还需要我们采取新手段。

这一新的手段就是推行产业组织政策，重组省内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改变企业的数量或组织方式，增强集体作战能力，推行“一体化”经营战略。就当前情况来说，这种战略在江西的资源产业如烟草行业、旅游行业和矿藏开发等行业，运用的威力十分巨大。我们仅以烟草和旅游行业为例。如果江西的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在烟草行业推行产业组织政策，组建自己的烟草集团，同时使企业家能力到位，集中运作赣烟，统一品牌和市场，分散生产（小烟厂成为生产基地），打出江西烟叶的品牌，我们估测，达到 100 亿~150 亿元的年收入是可以做到的。可想而知，对当前的 40 个亿来说，重组收益是巨大的。

在旅游行业，我们也可以用横向一体化的经营战略。办法是用最有名的景点收购即一体化一般性的景点，组建若干个旅游经营集团（用谁一体化谁当然还可以研究）。各旅游集团之间要交叉持股，以达到自然的合作关系。如果集团模式运作有效，打出江西的旅游品牌，江西每年从旅游上获得四五十个亿以上的收入不是很难的事，因此重组收益也十分巨大。

除了典型的资源产业之外，产业组织政策还可以在很多行业发挥作用。在全国各地还没有普遍运用产业组织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快人一步，因为只有快人一步，效果才十分显著。

3. 把握实现江西经济发展的条件：推行地区人力资源战略管理，奠定经济发展的人才基础。如果措施到位，江西的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这一切都要靠人来做，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得归结到“人”这个因素上来。在当前条件下，江西政府一定要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江西的地区人力资源战略管理，要将重点放在吸引、留住和发挥这样几类人才的作用：第一，进行制度管理和创新的制度管理人才（通常所说的政府官员）；第二，进行经营管理和创新的企业家；第三，进行技术和劳动方式创新的科学技术人才；第四，善于培养人才的人才（最后体现为发展教育事业，对本地区来说效益最直接的是发展高等教育）。

推行地区人力资源管理要有新举措，不能再用像过去那样只靠金钱来吸引人的简单办法。新举措的根本是建立一套发挥人才作用的机制。这套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其一要保证真正的人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要埋没人才，这是选择机制；其二是要使人才的劳动所得和其贡献成正比例，这是激励机制。

总之，只要政府治理结构理顺了从而能力到位了，企业和产业组织制度有效了，市场机制灵了，从而人才也就有了，我们就不用愁事业做不好。

近两年来江西经济发展的 回顾与前瞻

两年来，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江西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为江西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微观基础，更重要的是逆转了原有的下滑趋势，从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使江西走上了全面发展之路。这一切，已经改变了江西人的落后形象。

由于江西的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原有路径的惯性较大，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启动江西经济增长的引擎，但要使江西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在中部地区的崛起目标，我们还有更多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更多的工作要做。回顾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成功之处，发现与检讨不足，对下一步的发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一、两年来，我们真正改变了什么：江西演进路径与发展形势的逆转

江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之后，在 90 年代又形成与条件类似甚至条件更差的内陆省份的差距。这种下滑的趋势到最近两年得到了实质性的改观。

两年来，江西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猛，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城市面貌翻新，人气指数递增，居民消费信心强劲，GDP 首次出现两位数增长，等等。

作为表象层次，这些变化是大家都能够亲身感受得到的。作为经济学者，我们要进一步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变化带来了这些可喜的成果？

（一）政府能力和行为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认为，能够使江西的发展形势得以逆转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行为能力和行为环境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在过去，由于特殊的初始条件和演进路径，形成了弱政府机制，并造成了两个很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政府行为方式和环境：其一是政府官员思想保守，不敢创新；其二是“做官不做事”。

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后，很快就抓住了多年来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两个要害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首先，通过确立新的规则（即使干事的边际收益大于拍马屁的边际收益）来改变江西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从而快速改变了整个政府体系的行为环境，基本上形成了“干而非拍”的各级政府新行为模式。

其次，通过开放性措施（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和发达地区交流干部等）来解放江西政府官员的思想，提高政府官员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水平和操作能力，并以任人惟贤的规则重组了政府体系部分人事，让更多的懂市场经济、善于驱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贤士掌握经济管理决策权，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各级政府的能力严重不到位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两个环节的变化是战略性的，其他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这两个变化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二）明确和操作准确的总体发展思路，启动江西经济增长的引擎

上述两个环节的变化，为江西经济发展奠定了组织与制度基

础，但要产生实际和明显效果，还需在宏观层次上明确发展思路，并使战略措施到位。改革开放后，江西历届政府都想采取措施改变江西落后的面貌，但由于长期依赖农业强省、以农为主的发展思路和战略，同时又缺乏可操作的发展办法和措施，在保守和封闭的环境中，无力挽回与外省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局面。近两年来，江西的领导人根据江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提出了比较准确的发展思路，使形势逐步逆转过来：

第一，利用快速而有效的手段，迎接和启动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效应。改革开放二十年后，江西的优势是从东、南等方位靠近浙江、上海、广东、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方存在巨大的产业、资本向内地转移的潜在需求，能否和内地省份竞争沿海发达地区的资本、产业转移等资源，是江西经济发展的第一要义。

显然，我们十分敏感而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并采取了两个十分有效的手段：其一，快速发展基础设施，特别是快速发展高速公路，把和发达地区的通道尽快打通；其二，通过推进城市化建设、改革和改善政府服务等手段，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动招商引资活动，促成发达地区到江西的投资热潮。

第二，利用市场的办法和机制，充分发挥和利用江西的资源优势，使资源优势真正成为地区竞争能力的核心来源。和其他省份相比，江西是个资源丰富省（山水资源、农业、矿藏、劳动力等），但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历届政府都强调要利用江西的资源优势，但过于强调政府发动和行政手段，没有找到有效的措施。新的发展思路采用市场机制，利用开放型办法，结合招商引资活动，因而初见成效。

第三，确立工业强省的产业发展思路，利用民营经济等有活力的体制成分，聚内外资本之力，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根据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工业是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产业基础，民营经济是制度基础。新一届领导班子放弃了在江西执行了几十年的以农为主的发展思路，第一次明确了依靠工业强省（并非

不重视农业)的正确思路,找到了向浙江学习和模仿浙江经验的操作方案,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新的体制和办法来发展江西的工业。

上述正确发展思路,以“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这一干部容易理解和操作的通俗话语体系,贯彻到江西各级党政部门,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指南,启动了江西经济增长的引擎。

二、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问题

江西经济增长的引擎虽然已经被启动,而且已经取得两位数的增长实效,但离崛起的目标仍然较远。从我们的目标来看,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达到目标,还需采取进一步的发展措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存在的几个要害问题。

(一) 缺乏长期快速增长的成熟基础

两年来,江西上下思想被搅动,随之,全省各地的经济工作得以全面启动,均取得一定的实效。但是在绝大部分地方,增长的微观基础不是很牢靠。

从增长的来源上看,近期的增长主要是投资驱动型的,但投资驱动缺乏产业集聚的组织环境和基础。像江西这样的地方,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模仿和投资驱动仍将是增长的主要途径。但只有简单而无组织的投资驱动,并不能保证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若无有效的产业组织方式作为依托,投资本身也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前,各地都引进了一些外资和企业,但即使是招商引资做得不错的地方,也很少能够做到产业的集聚。世界各地和中国发达地区的经验,尤其是浙江的经验显示,只有在产业集聚的整体环境中,一个地区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能力。

我们认为,“三个基地”首先应该是产业集聚的基地。坦率地说,各地在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产业集聚的

概念。很多零星的投资和工业新增项目，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地方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并无长远实力。若以产业集聚水平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地区竞争能力，江西各地均差之甚远。此问题不到位，江西崛起的希望很小。

（二）各地经济工作虽全面铺开，但缺乏系统理路，缺乏深度和层次

近两年来，通过确立新的规则和采取一系列活动，江西干部的思想确实得到了很大的解放，领导对发展经济的工作热情大增，各地争相采取各种发展举措，并相互竞争。各地的经济工作虽然都有所成效，但从目标要求来讲，问题仍然很大：

首先，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措施都具有粗放型特征，它们零星地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缺乏战略规划，在班子里缺乏统一和系统的理路，一旦领导变动，整个工作的连续性都难以保证。在启动江西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全民推动、先发展后规范等方式都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发展方式即使不存在较高的将来代价，却无利于地方的长远发展，因而需要规范和提升。缺乏系统思路的弊病已经在不少地方表现出来。

其次，在经济发展措施缺乏组织有序的同时，还缺乏深度和必要的层次，缺乏长远考虑。各地组织经济发展的工作虽然已经全面铺开，尝试和摸索了各种模式，但在采取措施时，往往表面的东西做得很多，工作浮在面上，深层次的问题触及不够。比如，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重引进、轻引进后的环境规制，以优惠政策为主要手段，不懂得或无意于全面建设投资环境；在城市化的问题上，很多地方都以亮化和形象工程为主，图表面好看，有的地方甚至把城市化仅仅理解为炒作房地产和提高房地产价格，制造虚假繁荣，不了解城市的真正功能。这种状况既和制度环境有关，也和干部的素质有关。要使江西的经济保持可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克服这些浮躁和浅化现象。